

民主的追求

秦立海 著

1948—1949：筹建新中国实录

“民主非流血不易得” 1948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从海内外奔赴解放区的历程漫长而艰辛。朱学范如何敢为人先进入东北解放区？首批北上的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台湾海峡遭遇了怎样的险情？郭沫若、马叙伦等乘坐的“华中”轮为什么在海上搁浅数日？最受瞩目的李济深如何逃脱毛人凤的暗杀？“知北游”们的不适和烦躁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变故让冯玉祥和杨杰壮志未酬身先死？为什么说张澜和罗隆基在疗病院命悬一线？宋庆龄最终答应北上其真正原因是什么？“侨界双子座”陈嘉庚、司徒美堂为何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进入解放区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新考验？《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协商民主最终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重温共和国诞生前夕先辈们的理想与追求……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民主的追求

秦立海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追求/秦立海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54-0117-1

I. ①民… II. ①秦… III. ①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史料 IV. ①K2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309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 亮
责任编辑 陈 亮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印张 2 插页 插图 41 幅 30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路在何方：从“窑洞对”到“光明行” 1

上 篇

一 香港避难：各民主党派的无奈选择 5

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 5

中间势力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大赢家 7

中国应该“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 11

民盟的解散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 13

香港成为民主党派的大本营 16

二 “五一口号”：吹响多党合作的号角 19

“五一口号”的历史缘起 19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的修改 21

“行宪”国大遭遇“对台戏” 25

毛泽东访苏前夕收到斯大林密电 29

三 历史之谜：香港与西柏坡的交通阻隔 33

出人意料的热烈响应 33

各民主党派与新政协运动 37

电报延迟事件的“真相” 42

“交通阻隔”的背后隐情 45

四 同舟共济：中共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南下 48

- 安全成为护送工作的首要问题 48
- “华润公司”的特殊政治生意 51
- 李家庄迎来平津沪的“特客” 53
- 各路民主人士殊途同归汇聚北平城 56
- 民主人士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58

中 篇

五 敢为人先：朱学范首先奔赴东北解放区 63

- 国统区工人运动的领袖 63
- 帮助解放区工会走向世界 64
- 与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决裂 67
- 取道苏联奔赴东北解放区 71
- 参与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76

六 谁敢涉险：第一批海上冒险者 79

- 沈钧儒：“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79
- 谭平山：国共两党的昔日风云人物 85
- 章伯钧：“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 89
- 蔡廷锴：从“分共”投蒋到抗日反蒋 92
- “波尔塔瓦”号台湾海峡遇险 96

七 一路放歌：郭沫若和马叙伦船上赋诗 99

- 郭沫若：“无党无派”的中共秘密党员 99
- 马叙伦：“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106
- 陈其尤：“只有中共路线才能救国” 110
- “华中”轮被拒绝在大连靠岸 112
- 胡绳和沙千里的“怪招”之旅 114

八 焦点人物：李济深的政治考虑与现实抉择 116

- 国民党内的“反对派领袖” 116

- 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重要对象 119
- 李济深的联合政府构想 122
- 民革的军事策反活动 125
- 李济深应邀秘密北上解放区 129
- 李济深躲过毛人凤的暗杀阴谋 136

九 延安归来：黄炎培辗转香港赴北平 138

- 死里逃生的“革命党” 138
- 离开官场办教育 140
- 为抗日救亡而奔走 142
- 轰动一时的延安之行 144
- 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 147
- 黄竞武上海遇难 150

十 书生本色：“知北游”的兴奋与困惑 152

- 充满诗情和激情的旅途 152
- 会讯国民党俘虏和战犯 156
- 中共的盛情款待令人“受之不安” 159
- 难以适应的解放区文化教育政策 160
- 亲身体验解放区开会之苦 162
- 柳亚子的“牢骚”因何而来？ 165

十一 壮志未酬：冯玉祥和杨杰的中途遇难 170

- 将军赴美“考察水利” 170
- 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 172
- “胜利”号上的离奇火灾 176
- 远离战场的天才军事家 181
- 积极投身民主进步活动 184
- 香港澳仔轩尼诗道 302 号的罪恶枪声 186

十二 虎口脱险：张澜和罗隆基的成功获救 190

- 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190
- 从书生论政到庙堂问政 194
- 拒绝李宗仁的“调解”要求 198

- 阎锦文奉杨虎之命冒险营救 200
“中央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第一老” 203

十三 女中豪杰：宋庆龄乘坐专列离沪赴平 206

- 李宗仁力邀宋庆龄“出山” 206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出邀请电 207
邓颖超专程赴沪迎请宋庆龄 209
宋庆龄与中共在上海解放之初的误会 211
宋庆龄北上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14
毛泽东亲赴火车站迎接宋庆龄 215

十四 侨领情怀：陈嘉庚和司徒美堂返回祖国 218

-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218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22
“民主非流血不易得” 227
洪门“大佬”的爱国深情 232
“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 236

下 篇

十五 保持一致：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新发展 243

- 张申府与《呼吁和平》 243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 248
民主党派公开接受中共的领导 251
中共明确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 254

十六 海纳百川：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筹备 258

- 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的达成 258
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的确定 263
被新政协拒之门外的党派团体 266
新政协代表人选的协商和确定 27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确定 275

十七 除旧布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准备 277

《共同纲领》的起草 2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由来 281

国旗、国歌、国徽的拟定 284

十八 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 2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2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295

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安排 297

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真诚合作 301

结语 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 305

参考书目 308

导言 路在何方： 从“窑洞对”到“光明行”

1945年7月初，在陕北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答。

当时，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表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此，黄炎培评论道：“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①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它深刻揭示了“民主”是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新路，更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近代中国，所有党派都曾以民主相标榜相号召，除了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主新路外，国民党蒋介石也曾口口声声许诺要实行民主宪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把民主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奋斗目标。

不过，民主也有真假虚实之分。抗战胜利后，中国就面临着国共两党和中间势力所追求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民主选择。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一直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但迫于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答应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力求为其专制独裁统

^① 参见《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05页。

治披上一层民主的合法外衣。

中国共产党则希望通过与国民党和中间势力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彻底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使战后中国逐步走上自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最终迈向社会主义。

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则主张在中国走一条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即西方式的议会制、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改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曾一度使中间势力的政治理想充满希望，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很快发动了全面内战，使战后中国失去了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难得历史机遇。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坚决反对，单方面宣布召开“制宪国大”，实行“民主宪政”，从而彻底暴露了其所谓“民主”的庐山真面目。

此后，国民党蒋介石更是不顾其所谓“民主”形象，对一直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的民盟等民主党派不断施以暴力进行迫害，并于1947年11月强迫民盟自行解散，从而宣告了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路线的破产。

三者去其二，中国民主之路，究竟路在何方？显然，除了中共所主张的民主“新路”，已经别无选择。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不会走此“新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则不然，他们在发现自己的民主之路走不通后，毅然转向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之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各界民主人士在中共的邀请和护送下，纷纷从香港等地奔赴解放区，开始了追求民主的“光明行”。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那幅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去重温共和国诞生前夕民主先辈们的理想与追求……

上篇

香港避难：各民主党派的无奈选择

“五一口号”：吹响多党合作的号角

历史之谜：香港与西柏坡的交通阻隔

同舟共济：中共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南下

—— 香港避难： 各民主党派的无奈选择

1947年，中国迎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年代。

这一年，不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而且长期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也失去了中立的余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抉择。

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一直是国强共弱，尤其是在军事力量方面，国民党始终占据优势地位，直到1947年初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这年2月，面对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有利军事形势，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表示：“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①

果然，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就占领了中共中央驻地——延安。这似乎再次验证了蒋介石此言不虚——“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延安也不例外。

然而，毛泽东却断言：“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原来，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随后，自3月底至5月初，彭德怀率领西北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战役的胜利，共歼灭胡宗南部队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紧接着，5月中旬，陈毅、粟裕率领华东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3万余人，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①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2页。

对此，蒋介石惊呼，“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大家如果再不大彻大悟，急起直追，不但革命事业无法完成，而且我们剿匪军事，恐将陷于最后的失败，整个为共产党所消灭”^①。

此时，蒋介石已经完全没有了年初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气。

5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掠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②

情急之中，蒋介石使出了卑劣手段。6月25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以“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名，下令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

然而，没有逮着毛泽东，却迎来了中共的战略进攻。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有时，历史在时间上是如此的巧合，但实质内容却大不相同。

同样是在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宣称：“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之途径，已因共产党之迭次峻据而告绝望，为保卫国家基础，扫除建国障碍，拯救匪区同胞，亟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③

7月4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一致通过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以此为标志，蒋介石正式放弃了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沿用达一年之久的“不宣而战”方针，进入所谓“戡乱”时期。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实行剿匪总动员案，此乃为政治上对共斗争胜利之基础乎？”显然，连蒋介石自己对“总动员”能否挽救国民党的失败命运都已没有信心。

7月14日，中共新华社在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这个公式连蒋介石集团也无法否认。”

国民党要员王世杰随即在日记中对此论断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予近来极消

① 参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25页。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459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906页。

极，然不能决。盖予今日之选择，一为引退；一为继续尽其力之所能为，以阻止国民政府与本党之总崩溃，不计成败与毁誉。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①

为设法挽救国民党的总崩溃，7月下旬，美国政府派魏德迈来华考察，寻求对策。然而，一向亲蒋反共的魏德迈来华一周后，即十分沮丧地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感到中国国民党人在精神上已瓦解。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死，要做出牺牲。他们已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失去信心。他们预见到彻底垮台。因此，那些在位者就贪污腐化，趁着垮台之前能捞多少是多少。国民党的士兵反映了这种态度，根本不愿打仗。”^②

1947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如实地记录了国民党及其本人的困境与无奈：“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③

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困境和无奈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则表现出空前的信心和豪迈。

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④

后来，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当时，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⑤

但是，事实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中国革命的确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中间势力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大赢家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了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国共两党之外，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主要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中间势力。

①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1947年7月16日。

②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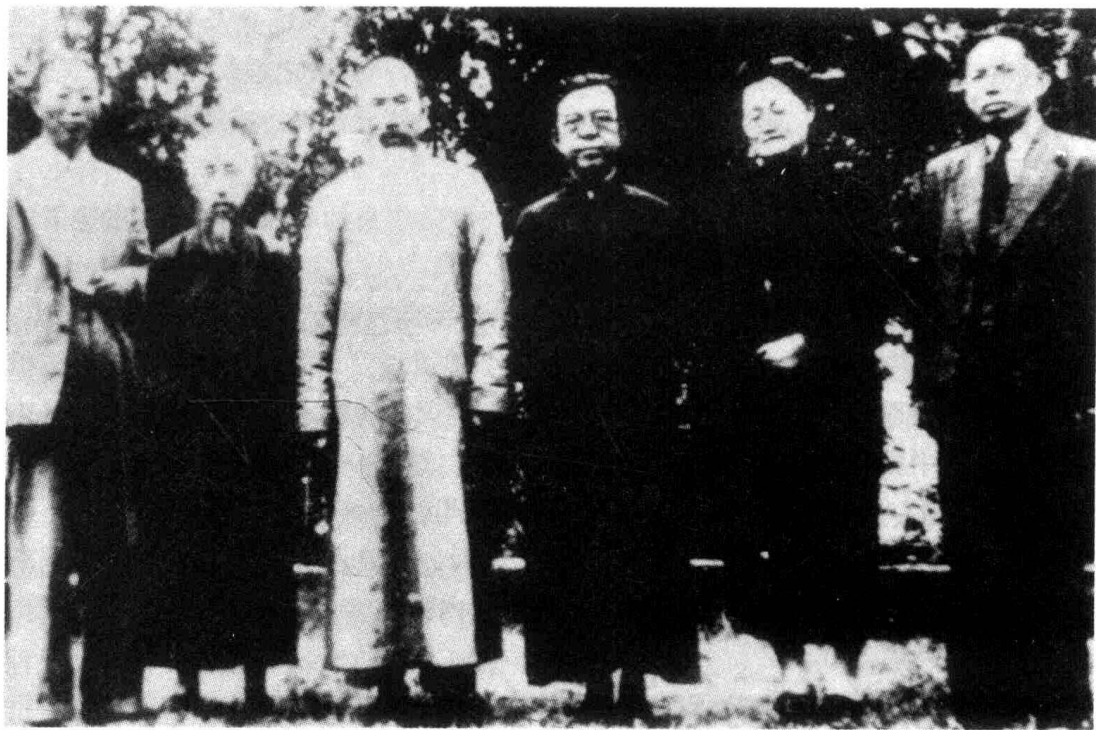
③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5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

⑤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页。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例如，由谭平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以及由其改组的、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就被称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等“三党三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后来，为便于吸收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组织，遂于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民盟等党派因为主张民主、团结、抗战，从而被中共称为“民主党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图为民盟主要领导人（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女）、章伯钧。

抗战胜利后，迎来了中间势力的大发展时期，新的民主党派纷纷建立，如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九三学社等。民盟等原有党派也纷纷召开会议，发表宣言，阐述主张。中间势力成为了战后中国政治舞台上众人瞩目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当时，民主人士组建政党，就是为了参政议政；而要参政议政，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区别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中间势力在战后很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被确认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抗战胜利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图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在重庆召开。图为大会代表罗隆基（前排左三）、李公朴（前排左四）、沈钧儒（二排左四）、张澜（二排左五）等同工作人员合影。

民盟认为，英美和苏联民主制度的经验，“都是中国今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好的参考材料”。“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民盟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①

显然，民盟要为中国建立的民主制度，“既非国民党的路线亦非共产党的路线，既非英美的路线，也非苏联的路线”，而是“在英美资本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寻找一条新的路线，即所谓的第三条路线”。

当时，民盟作为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党派，其上述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共同政治理想，因此也成了战后中间势力的共同奋斗目标。

为了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进而由理想变为现实，民盟等中间势力的参政热情在战后空前高涨，并利用美苏干预和国共相争的有利时机，获得了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参政资格，从而实现了与国共两党同堂论政，共同规划战后中国政治蓝图梦想。

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38名代表组成的政治协

^① 参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5、77页。